

# 中国和印度城市的崛起

The rise of Chinese and Indian cities

中国和印度是地球上的两个超级人口大国。两国的人口共计 25 亿，占世界人口的 37%（2008 年世界总人口约计 67 亿）。两国即将成为经济巨人，他们给国际舞台上传统的大国关系带来了急剧的震动，位于内罗毕的联合国人居署区域技术合作司司长丹尼尔·比奥（Daniel Biao）写道。

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形成，正如 1955 年万隆会议以来不结盟运动呼吁的。

如果各国的国力根据该国政府施行的经济政策而彼此不同，那么其根本的基础在于该国的人口统计，在于居民人口数、可用的和在职的劳动人口数。历史多次显示，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潜力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国力还与人口的区域分布相关，例如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对比在专业出版物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是，他们很少强调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城市增长

利用联合国人口司最新的报告《世界城市化前景：2007 年修订版》（World Urbanisation Prospects: The 2007 Revision）提供的数字，可以做出比较。这些统计数据是唯一国际认可的数据，为所有联合国成员国所接受。这些

数据是在各国统计局的合作下统计出来的。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从人口统计的角度，在两国及其人口聚居区之间，做出第一手的比较。

1985 年，中国拥有 10.67 亿居民，印度是 7.71 亿（比中国少 2.96 亿）。40 年后，即 2025 年，中国和印度人口数将大致相同，达到 14.5 亿。2008 年，中国拥有 13.35 亿居民，印度则是 11.85 亿。因此，目前两国之间的人口差距约为 1.5 亿。印度人口增长比中国快很多，这是因为缺乏计划生育。目前，印度的人口年增长率约为 1.4%，相比之下，中国的增长率很低，是 0.58%。中国的人口正在老龄化。这种状况构成了中期的风险，与欧洲必须面对的风险相似，由于职业人口比例降低，欧洲不得不面对维持代际连带（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的风险。

1988 年，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化速度相同，都是 25%。2008 年，中国的城市化比例是 43%，印度只有 30%。中国的城市年增长率是 2.7%（目前正在下滑至 2%），而印度是 2.4%（目前正在上升至 2.6%）。1985 年至 1990 年，在改革之初，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每年 5%。

20 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惊人（在绝对数字上，城市居民人口数翻了一番，从 2.88 亿增至 5.77 亿），印度也显示了同样的普遍发展趋势，但是速度较慢（城市人口从 2.05 亿增至 3.50 亿）。根据联合国的预



当前中国的人口年增长率约计 0.58%。照片版权：C. Ringo



拥有 730 万人口的天津是近 20 年来急剧城市化的众多中国城市之一。

照片版权: Tudou Mao

测, 2030 年, 中国城市人口比例应该是 62%, 而印度应该是 41%。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很有可能在 2016 年前跨越 50% 的门槛。

### 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征

就大城市的规模而言, 中国和印度大体相似。实际上, 两国拥有同样数量 (8 个) 的人口超过 500 万的城市。2008 年, 中国的城市是: 上海 (1530 万)、北京 (1130 万)、广州 (900 万)、深圳 (780 万)、天津 (730 万)、香港 (730 万)、武汉 (730 万) 和重庆 (660 万)。同样在 2008 年, 印度的城市是: 孟买 (1930 万)、德里 (1600 万)、加尔各答 (1500 万)、钦奈 (730 万)、班加罗尔 (700 万)、海德拉巴 (650 万)、艾哈迈达巴德 (550 万) 和浦那 (2010 年人口将达到 500 万)。两者的类比十分惊人: 排名榜首的是两个大港口, 其次是两国的首都。括号中的数字对应的是有形的人口密集地带 (在国际比较中唯一恰当的因素), 而不是关系到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常常把大片的农村区域涵盖在内 (重庆直辖市在超过 82300 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聚集了 3200 万居民, 在实际意义上是一个“小”省, 按照这种行政定义, 它会是排名在东京之后的

“世界上人口第二大城市”! )。

应该注意的是, 印度最大的八个城市相比中国大陆七个最大的城市在国土分布方面好很多, 中国的七大城市中除了武汉和重庆其余都坐落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印度, 德里、加尔各答、钦奈、班加罗尔、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组成的六边形很好地覆盖了几乎整片国土。

在中国, 城市化密集区主要集中在三条东部走廊: 北部的渤海工业区 (北京—天津—唐山)、中部的长江 / 长江三角洲 (上海—南京—杭州) 和南部的珠江 / 珠江三角洲 (广州—深圳—香港)。我们可以补充两条次级走廊: 山东半岛和长江流域。深圳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这个城市的人口在 20 年间增长了 9 倍, 显示出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经济改革以来经济特区的繁荣及沿海省份移民人口的规模。假如把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看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 那么这个拥有 6500 万人口的地区将是世界上第 18 大经济体及第 11 大出口体, 排名在印度之前。据《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报道, 过去 25 年来,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年均增长速度惊人, 达到 17%。

2008 年, 中国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有 100 个, 人口超过 75 万的城市有 140 个, 人口超过 10 万的城市有 670 个, 而印度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 (被称作 metro-cities) 只有 35 个, 人口超过 75 万的城市有 57 个, 人口超过 10 万的城市有 400 个。

位于中国沿海 300 公里宽狭长地带的城市网络大约占中国领土的 10%, 但制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占到 75%, 城市分布十分密集且相对均衡, 而印度仍然是一个由大型农村、中等城镇构成的国家, 这些居民区空间

分布合理，但是彼此之间的联系很差。

### 根本的结构差异

对城市化的主要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对于确认两个国家之间的结构差异十分必要，因为两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各自独特的、有时候还是相反的特征。

对于两国而言，历史都很重要，两国也都是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度。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基本上是内源性的（从黄河到长江流域），除了两个著名的北方朝代：蒙（元朝）和满（清朝）。从根本上讲，印度的历史是外源性的进程（起源于印度河和恒河平原，但主要决定因素是 13 世纪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他们建立了德里苏丹国，之后是 1526 年开始的莫卧尔王朝，及 18 世纪末开始的英国殖民，直到创建新德里）。在这两个国家，城市发展方向都是从北方发展到南方。

在历史因素之后，经济是解释城市化进程的第二大因素，相应地，城市化动态也可以在部分上解释经济发展。如果两国在 1987 年拥有同样的人均收入，那么，20 年后，这个数字在中国已经翻了两番，在印度翻了一番。因此，目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大约是印度的两倍，2005



印度的城市增长率在上升，而中国的增长率在下滑。

照片版权：Nicky Casey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 7600 美元，而印度是 3800 美元。中国的腾飞比印度迅速很多，尤其是因为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改革启动较早，使中国的城市富有活力。中国的年均增长率是 10%，而印度是 8%。

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专业化及印度在信息通讯服务方面的专业化不应该掩盖两国经济逐步的多样化，及高科技在两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日益增高的比例。中国的出口额（2006 年达到 8000 亿美元）是印度出口额的 10 倍，但是这个相对差距将很可能在未来有所减小。

两个社会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国家机器的作用。中国的国家机器强大（但是正在缩减，过去 20 年来，中央各部委已经进行了精简）；印度的国家机器弱小，既是在立法和规章制度领域，也是在指导公共投资及控制并监督私营公司和公共公司方面。这一点在中国表现为刻意城市化的政策和市政府的能动性。这种情况与印度形成对比，在印度，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性的，与之相关的表现是自由放任主义，其特征之一是在一切城市事务上都持续并冗长地追求共识（英式传统？伦敦从来没有一个总体规划……）。尽管如此，印度的联邦政府似乎近年来有所醒悟，不仅保护大公司在国际磋商中的利益，而且帮助各邦更好地应对这些公司在基础设施上的需求。

其实，如果说在中国，国家、地区和城市基础设施的质量已经有了很大提升的话，那么，印度的基础设施质量仍然低下。这与投资率相关，中国的投资水平非常高（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45%），而印度的水平仍然过低（25%）。同样地，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数目庞大（2005 年达到 800 亿美元），而在印度，外国直接投资目标性极强（2005 年达到 66 亿美元）。对于印度来说，大幅度提高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变得越来越紧迫。

在中国，政治和财政权力下放是系统化的，尤其是从 1994 年以来，而在印度，相比之下，尽管 1992 年通过了宪法的第 74

项修正案，权力下放仍然很不均衡。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大城市，地方政府收入很高（由于公共土地销售和企业所得税），而在印度联邦，地方政府收入则取决于各邦政府各不一致的善意，这是有效的权力下放的最佳指标。在中国东部，城市人均年财政收入达到200美元，是印度同类数据的10倍还多。

货币贫困或收入贫困在这两国持续性地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必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但是，生活水平的贫困，虽然在中国以同等速度降低，但在大多数印度城市却持续不变。“住房贫困”在城市密集区显著可见，在印度尤为明显，从非正式住房在城市结构中的相对比例（印度的比例大约为50%，中国比例约为10%至15%）就有所显现。

近年来，中国建造了数目庞大的高层居民楼，在城市刺激措施的支持下，由公共和私营开发商针对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建造（接近于每年1000万个住房单位）。与此同时，在印度，公共机构建造的社会住房没有增多，印度的发展趋向于高成本投机住房。相对于纺织品或洗衣机的出口，中国的奇迹实际上更多的在于大量建造5万美元一套的公寓，这种建设迎合了那些常常处于隐形状态下的家庭储蓄被调动起来而带来的需求。不过，这其中并不排除在各大城市的高雅地段的奢华公寓报出令人生畏的价格（西式风格和价位）。

### 显著的相同点，共同的利益

虽然中国和印度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但是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这和两国面对着一些相同的挑战有关。最近，两国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和解就不仅仅是烟雾弹。

中国和印度领导人都把他们的城市视为创新、增长和出口的动力，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为他们带来了最大化的利益。但是，他们在这个共同的构想上都表现谨慎，因为在政治上，他们不得不把根深蒂固的农村传统考虑在内，对今后两三代还将继续居住在（已经

过度拥挤的）农村地区的数亿人口表示关注。

他们都有意鼓励强化地方权力机构，中国的地方权力机构更自治、更有活力，而在印度，地方权力机构正在逐步萌芽。次国家（地区）级政府（中国的省，印度的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制定城市政策和资金转让，鉴于国土面积的辽阔，次国家政府的重要作用当然是不可或缺的。

尖锐的区域差别、匮乏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在能源方面）和庞大的环境问题（空气和水污染、能源密集型生产模式、过时的重工业等）构成了主要的制约因素和威胁，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都开始意识到：中国每年投资400亿美元用于改善其居住环境，而污染造成的损失高达投资数字的两倍，污染的主要影响涉及生产力、健康和生命的丧失。

资本市场和抵押贷款的迅速扩张，作为保障全面执行市场经济的最后的缺失因素，在两国都有所表现，其发展方式有些混乱但很谨慎。

印度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大体而言比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更高效、更透明。

技术能力的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青年一代中）应该被工业化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视为真正的危险，部分原因是国内市场大量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快将寻求国际机遇（包括通过在家工作，参见班加罗尔的情况）。

中国的建筑公司已经在世界各地赢得公共工程合同。尽管如此，中国和印度在许多领域都遭遇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匮乏。今后几十年，两国将需要大量投资于高等教育。

最后，坚持西方的消费模式，如私家车、快餐、超市、购物中心、现代化建筑、摩天大楼，有时候对其进行在外国人看来是俗气或浮夸的地方化改造，与毫不掩饰的民族自豪感、在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中存在的激烈的竞争精神以及对未来近乎盲目的信心形成鲜明对比。

## 与西方世界的简略比较

中国和印度再次显示，城市既是发展的根源，同时也是发展的结果，城市化与社会经济进步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保罗·贝洛克 (Paul Bairoch) 在他出色地综合了城市历史的著作中，检验并展示了这一法则于不同时间段在许多地区的表现。这个法则在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中彰显无遗。

中国的城市发展传统上是自我中心的，至少是直到 19 世纪为止。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动态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其近期的扩张可以与美国一个世纪前 (1880 年至 1930 年间) 的进程相比，城市化集中于沿海地区（美国东海岸和加利福尼亚，中国东部沿海）和大型内陆就业盆地（人们可以联想到重庆和芝加哥之间、四川和美国中西部之间迷人的相似之处。）显然，上海正在成为新的纽约，浦东旨在挑战曼哈顿。主要的差别是美国的城市主要致力于国内市场，而中国的城市优先考虑外部市场（虽然中国的国内市场也在迅速扩张）。但是，两者增长率是类似的。传统上内向的中国已经在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变得外向。

印度的空间发展看上去更像是 1800 年左右的欧洲国家，按等级排列的城市网络、匮乏的财力，及与之对应的占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和低下的基础设施。其实，印度的经济是群岛型经济，由高科技的群岛围绕设施匮乏的内陆。印度直到 1947 年前一直是外向的，在其后 40 多年里变得内向，直到 1991 年改革启动广泛的自由化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广为人知的成功范例），目前，这个自由化进程仍在进行中。

中国和印度的城市看起来在废除城区和郊区两分法方面有着共同之处，两分法既是欧洲城市的特征（拥有富足的城区），也是美国城市的特征（富人居住在郊区）。除了某些例外（如班加罗尔），亚洲城市正在日益多中心化，这是由于土地市场和投资者战略的隐形之手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已经取代日本，占据西半球

的思维，成为西半球的恐惧。名副其实，因为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国凭借活力与战略部署明确威胁到了富有国家。

就城市管理而言，从我们的比较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很明确，虽然不是非常独特：一个国家必须根据从属性原则 (*subsidiarity principle*) 进行权力下放，更多地投资于城市和城市间的基础设施，采用现代先进的手段和技术（如卫星定位城市信息系统），努力改善生活质量来使城市更有吸引力，促进连接城市、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城市走廊或大都市区域的发展，推动区域间的协同。只有这样，目前的“全球化”进程（更地方化的政治、更全球性的经济）才能造福更多的国家，不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因此，在地方一级和次国家（地区）一级，需要付出的努力还有很多，包括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也是这样，鉴于当前单一民族国家的显著衰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中国和印度，城市是新增长模式的动力。虽然背负着一些沉重的负担，城市还是把经济引领到正确的发展方向，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城市的外贸绩效，还表现在减贫和对环境有着新的关注，虽然这种关注尚嫌不足。

城市专家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些急速繁荣中的城市的演化进程。它们正在推动当前亚洲的革命。

中国有句老话：“要致富，先修路”，在 21 世纪再次得到了验证。

作者丹尼尔·比奥生于法国，是一名城市规划师和社会学博士，专业领域是城市和住房政策。他拥有 30 多年的国际经验。

王瀛 译自 Urban World  
Vol. 1 Issue 1 Nov. 2008